

結論

如果從一九二二年湖南「農村平民教育社」的活動來看，中共是第一個有組織、有計畫的農村教育工作團體；再從江西時期的教育推展來看，中共則是第一個具有大規模農村教育經驗的政權，因此稱中共為中國農村教育的先驅並不為過。過去提到農村教育，最廣為人知的要算是晏陽初在河北定縣所進行的「鄉村平民教育」。但嚴格來說，在援引大量外來資金和人力的情況之下，¹晏陽初的成就只能說是為農村教育建立了一個理想典型，並未面對農村教育真正的問題。一九二六年的定縣，晏氏正在推廣「幻燈教學」、「留聲機教學」，但是一九四〇年前後的陝北農村，學生卻連寫字的紙筆都缺乏，兩相對照之下可以知道定縣經驗實際上已經脫離了現實的農村環境。

陝甘寧邊區的農村教育可說是中共教育理念一次大規模而徹底的試驗，這些理念和作法一部分是源自於國內當時教育思潮，一部分則是來自中共過去在農村中所累積的教育經驗。受到平民教育運動的影響，中共的農村教育將兒童和成人的教育置於同等重要地位，發展出一套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並行的教育體系；根據長期的農村教育經驗，中共針對農村中教育資源不足、農民工作忙碌的特殊環境，設計了許多革命性的教育措施，有簡單、彈性如「識字組」這樣的教學形式，也有正規如「冬學」這樣的季節性學校。過去學者們批評陝甘寧邊區早期的教育模仿西方國家和國統區的教育制度，但事實上早從江西時期開始，中共的教育便已經跳脫了西方或是過去中國官方的教育思維。

研究陝甘寧邊區教育過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農村教育上許多獨到的作法外，莫過於中共在教育推展上的執著和企圖心。過去的研究焦點集

¹ 晏氏早年的平民教育運動依靠基督教青年會的資金和人力協助，定縣工作開始後得到了檀香山華僑的捐款，晏氏本人也曾赴美國籌募大量經費，並在一九三四年得到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見吳相湘，《晏陽初傳》(台北:時報文化，1981年)，頁53、135、349。

中在「正規化」和「民辦公助」兩項措施上，很容易將邊區教育的發展理解為「兩條路線鬥爭」。但如果從一九三七年「普及教育突擊運動」一路往下看，從「正規化」、「義務教育」、「新文字運動」、「獎勵私學」一直到「民辦公助」，其實是一個「摸石頭過河」，不斷試驗和修正的過程。雖然在事後看來這些措施都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從這些措施的推展和興替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農村教育的種種面相，外人難以想像的問題，中共解決問題的思維和決心，這或許是本研究最重要的意義所在。

無疑的，陝甘寧邊區農村教育推展的最大障礙在於客觀條件的困難。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間的快速發展主要得力於邊區當時相對平靜的局勢，邊區政府有較多的餘力兼顧，教育負擔對於民眾的生計影響也相對較輕。不過一旦戰時環境丕變，經濟條件惡化，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教育活動便成了難以承受的負擔，大幅裁減學校成了不得不然的選擇。在生存和生計溫飽尚且有虞的情況下，中共不顧環境條件限制，費盡心思所發動的各種教育措施，無論是「新文字運動」、「獎勵私學」甚至是革命性的「民辦公助」，其實都難有預期的效果。

陝甘寧邊區農村教育研究最大的爭議在於「正規化」和「民辦公助」的評價。過去學者一直將「正規化」和「民辦公助」當成對照的兩種典型，「民辦公助」初期的盛況和「正規化」之後的衰退發展決定了兩種典型的正反不同評價，只不過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評價都不盡客觀。過去學者們批評「正規化」是「重質不重量」的迷思，是一九四二年以後大幅裁併學校的原因，但實際上「普及教育」才是中共教育一貫的理想，「正規化」不過是對教育品質的最低要求，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質量並重」的訴求。「正規化」方針一變成爲「重質不重量」是在邊區經濟條件惡化之後，裁併學校的措施主要還是受到「精兵簡政」的影響。平心而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間的「正規化」期間正是邊區教育發展的高峰期。究竟這時期的農村教育活動爲中共培養出多少有用人力、發揮了多少的政治教育效果實在難以判斷，但數字統計顯示，這一段時間是邊區史上學校數、學生數最多的時候；而從當時各種資料來看，這期間也是教育推動落實於農村社會基層較爲成功的一段時間。

相對於正規化的過低評價，過去學者們對於「民辦公助」的評價顯然有溢美之嫌。首先，「民辦公助」彈性多元的教學形式確實在困難的條件中增加了普遍推展農村教育的可行性，改善了過去集中學習所帶來的不便和民怨，但在沒有固定課程、教材和師資的情況下，正如 Vilma Seeberg 所言，這是降低教育效果和品質所換來的結果。其次，「需要與自願」的原則確實是「普及教育」觀念的一大進步，但從當時的條件來看，對於教育的推動並無實質的幫助。無論是清末的「開民智、鼓民力」、民初的「教育救國論」，還是中共抗戰初期的「國防教育」，「普及教育」一直是以國家為本位，以國家的需要為出發點。將教育的目的回歸到民眾的需求上，確實針對了正規化時期教育內容偏重政治、不適合民眾需要的問題。然而從各方條件來看，「民辦公助」的形式和條件所能提供的教育只是簡單的識字，在大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對於公糧、勞役負擔沉重的民眾而言，這樣的教育並非迫切的需求，也很難吸引他們「自願」負擔額外的費用和時間來接受教育。從一九四五年以後社會教育人數大幅下滑的情況來看，「民辦公助」的推行並不如一般認為的順利，除了不再引起民怨外，並未發揮太大的功效。

無論是「正規化」還是「民辦公助」，政策的產生有其對應的背景，孰優孰劣其實要視當時的環境而定。不過「民辦公助」的政策在整風運動之後制訂，打著「群眾路線」的口號，頂著「延安經驗」的光環，自此便有了難以撼動的地位。一九四九年曾經有教育官員指出，「民辦公助」只是戰時環境中的權宜作法，戰爭結束之後教育工作必需回歸「正規化」。²中共建國之後雖然也曾幾度試圖將教育路線拉回到「正規化」方針上，但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將「民辦公助」中非正規的教育觀念提升到了「政治正確」層面，³於是當初因應戰時環境的教育觀念便在中共「不斷革命」的過程中繼續留存了下來。時至今日，「民辦」學校依然存在，雖然已經不再強調彈性上課、分散學習的非正規教育方式，但是凡事「自行解決」的模式

² 江隆基，〈邊區教育的回顧與前瞻〉，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教育方針部分(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569。

³ 見姚若冰，《中國教育--1949-1982》(香港:華風書局，1984年)，頁39、66-71。

卻似乎沒有太大改變。中國大陸農村中至今仍然存在許多缺乏合格師資、缺乏經費、因陋就簡的民辦學校，普及教育的理想與農村環境的衝撞依然留有許多待解的問題。